

蔡昉：“劳动人口减少，经济增长潜力仍在”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同等发力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实际增长率是符合潜在增长率的，所以是合理的增速。

《中国经营报》：近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但是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你认为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的哪些变化能够支撑经济的发展？

蔡昉：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按照15~64岁这个口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随后就以加速度绝对减少：每年减少人数以万、十万、百万到千万的量级递增，到2020年已经累计减少了4170万人。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影响经济增速。但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是劳动力数量，还表现在一旦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劳动力素质的改善速度也就放慢；机器过快替代劳动力导致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提高，资本回报率就下降；劳动力流动减速，也导致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生产率提高速度慢了下來。这都是造成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实际增长率随之降低。我们已经看到，伴随着人口变化趋势，GDP增长率从2012年开始减慢。

第二，经济增速保持在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就意味着处于合理区间。根据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情况与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一

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随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从

个国家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没有特殊因素的干扰，实际增长率通常与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实际增长率是符合潜在增长率的，所以是合理的增速。然而，如果需求因素对实现增长潜力构成制约的情况发生，实际增长速度就会跌到潜力以下，就不再处于合理增长区间了。

第三，要防止总人口达峰的需求侧冲击。2021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已降至0.34%，接近于零增长，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与此相伴的是老龄化加深，2021年老龄化率达到14.2%，根据一般定义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一方面，人口就是消费者的总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较低，因此，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必然对消费需求造成冲击。所以，从2022年开始，中国需要高度关注需求收缩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这两年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人口出生率还会继续降低，这是否会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的GDP增长，需要采取哪些短期和长期的政策予以应对？

蔡昉：或迟或早，人口峰值和负增长终将到来，产生对增长速度的需求侧冲击。如果说经济发展新常态，过去主要表现在供给

“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的转变，与经济相关的诸多因素都在产生变化。蔡昉作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对人口与劳动经济的

侧的话，现在同时表现在供需两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同等发力。党的十九大和历次中央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相关部署，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无缝连接方式，落实好这些战略和政策。

从短期来看，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处理好“保市场主体”和“保民生”的关系。保市场主体是为了从供给侧促进经济复苏，使增速尽快回到潜在增长率的轨道；保民生则是为了稳定居民消费，稳住内需以便支撑合理的经济增速。稳住市场主体和保护好家庭都是“留得青山在”。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单位、生育养育教育子女的载体和扩大消费的载体，家庭也应该成为应对周期举措的政策目标。

从中期来看，推动改革并赢得改革红利，可以从供需两侧保实现增长目标。认识到需求制约这个新常态，促进共同富裕的举措需要加大力度，以破解消费制约。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城镇化，可以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大幅度增加城镇户籍人口，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显著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增加非农业劳动力供给，改善资

关系做过长期研究，他认为，虽然劳动力人口在快速减少，但是只要经济增速保持在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就意味着处于合理区间。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

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要分阶段不停地推进共同富裕。首先，合理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立足于在2035年之前把基尼系数降低到0.4以下。其次，围绕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升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最后，建立完善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人民福祉，增进幸福感，同时促进生育率向可持续水平回升。

争夺高素质劳动者

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均衡，有利于稳定区域人口格局。

《中国经营报》：一些人认为，中考筛选50%的学生进入到职业学校，是仿照德国模式，加大劳动力向高效率制造业的转移，你能否展望一下这些政策最终将取得的效果？

蔡昉：德国或许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但是，中国教育发展既要参考一般规律，也要从自身国情出发，特别是从当前和今后面临的现实挑战出发。制造业升级换代也好，高端服务业发展也好，都需要高素质劳动者。我们说的“高素质”，应该包括几个内涵。培养更高层次的技能无疑是职业教育所要发挥的功能。不过，技能是不断变化的，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更是日新月异。因此，还要培养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这就需要更加通识的教育，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不能画地为牢，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所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不应该有那么严格的区别，应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二，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出口也不应该人为区分，要形成一个人力资本培养的立交桥，条条大路通罗马。第三，并不必要事先把比例确定下来而一成不变。应该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标准，哪种类型的教育办得好、受群众欢迎，哪种类型的教育就应该获得相对领先的发展。

《中国经营报》：中国地区发展和收入不均衡，东部地区人均收入高，中西部地区收入相对低，我们看到一些东部省份在吸引大学生就业方面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这种趋

势之下，中西部和东部未来将发生哪些差异化的变化？

蔡昉：“人往高处走”。用较好的物质条件打造人才高地，无疑是吸引人才流动的制胜法宝。除了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之外，就业创业环境、城市宜居性、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发达地区都占优势，导致人才和劳动力“孔雀东南飞”。目前实施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将进一步改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条件，提高对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力。还有一些其他举措可以加快这个趋势。

首先，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甚至中小城市，可以在物质条件之外挖掘自身吸引力，即借助“水往低处流”的势能，主动降低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譬如，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大的力度和更快的步伐，就可以创造一个吸引人才和劳动力的优先优势。

其次，从国家层面协同整合各种类型的区域发展战略。每个地区实施的战略都为该区域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但是，如果每种战略实施效果相同的话，例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沿海率先同步推进，区域差距仍然存在。因此，区域均衡发展既要关注区域内的发展，也要关注区域间的均衡。

最后，国家层面促进区域均衡的最重要举措，就是加大再分配力度，尽快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均等化。区域均衡发展是在解决一个不均衡后，继续解决新出现的不均衡过程中不断实现的。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均衡，有利于稳定区域人口格局。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便可以因势而上。

“减负”降成本空间有限 调查显示外部环境逐步提升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作为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的窗口，企业微观成本变化成为衡量成本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15年开始，围绕“三去一降一

宏观税负下降

对于降成本政策的改革效果，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2021年“企业成本”在线问卷调查显示，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切实达到了减轻企业成本负担、激活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目标。

尤其是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大礼包”。“十三五”时期，我国减税降费规模超7.6万亿元，仅2020年就超2.6万亿元，2021年也达到了1.1万亿元的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减税降费政策对降成本的成效。

财科院以2020年调研结果为

风险转化为成本

虽然各类降成本减负政策实施力度在持续增强，但根据财科院每年的调研结果，目前多数市场主体感觉成本依然很高，未来发展压力也比较大。

“为什么政府连续多年出台减负政策，企业仍然感觉成本压力大？新发展阶段哪些成本是趋势性上升，哪些成本是趋势性下降？企业成本下降面临哪些风险挑战？”对于调研中社会关注高的热点话题，课题组相关人士如此总结。

从传统研究方法看，目前学界和政策部门研究降低企业成本的思路，一般都是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分类

成本出发。在财科院调研报告中，上述几个指标也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以人工成本为例，调研显示，2018~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0113元，实际平均增长

补”目标，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与之相关的是，尽管中央连续多年出台减负政策，但企业端的感受并不明显，尤其是当进入风险经济时代，企业成本越来越多来自于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仅着眼于减负目标似乎已经不够，而需要切实增强企业外部环境的确定性，从根本上对冲企业成本上升趋势。

事实上，自2015年底，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降成本就成为市场主体纾困、助力企业渡过

难关的重要发力点。总结6年来的改革效果，我国宏观税负呈现明显下降的态势。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看，这一数值从2016年的17.5%降至2020年的15.2%，下降了2.3个百分点，而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看，其也从21.4%降至18.0%，下降了3.4个百分点。在此之前，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降成本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

在刘尚希看来，这些变化进一步表明，当前持续出台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对降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调查选取的一个最直观案例，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企业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各种防控措施。比如，为保障复工复产，企业投入、采购疫情防控物资、执行隔离政策等，这些最终也转化为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刘尚希分析，这一案例也充分说明，当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或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时，企业成本就会普遍上升。“因此，整体看，要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仅着眼于当前的减负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增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努力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多因素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专家：企业应加强生产经营风险管理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经历2021年大幅上涨后，2022年再度出现上涨。日前，受俄乌局势紧张的影响，油价上涨接近100美元/桶；2月24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0元，为2014年9月以来首次。

有统计显示，截至2月17日，显示大宗商品价格综合变动趋势的JR/CRB指数和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分别报263.68点和92.97美元/桶，分别较年初上涨13.17%和17.71%。有数据还显示，截至1月底，CRB指数同比上涨46%，这也是自1995年有

大宗商品再度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

大宗商品价格后市怎么走？范若滢告诉记者，“2022年，大宗商品市场面临的影响因素将更为复杂、多元。从整体来看，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全球供应链逐渐修复等因素，预计大宗商品再度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

范若滢还分析说，从分品种来看，未来大宗商品价格大概率将呈分化走势。因为在范若滢看来，“一是原油等关键能源价格在地缘政治事件扰动、库存持

企业应加强自身生产经营的风险管理

这轮大宗商品上涨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几何？

范若滢对记者表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带动原材料价格上涨，提高企业成本、加大企业经营压力。尤其是在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退背景下，小微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偏弱，原材料成本上涨将给企业增加较大的经营压力，需警惕未来成本继续上涨给小微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

如何应对目前大宗商品价

可比数据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对此现象，中国银行研究院范若滢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除了前期大宗商品库存水平较低、全球供应链修复缓慢、全球流动性仍较为宽松等因素外，地缘政治风险成为2022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动力量”。

据范若滢分析，一方面，俄罗斯、乌克兰是能源、有色金属、粮食等多品种大宗商品的重要供应者，俄乌局势持续紧张将影响大宗商品供应的稳定性。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显示，2021年俄罗斯分别贡献了全球原油、天然

付的缺口可能高达10亿桶，同时经合组织原油库存降至七年来最低。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也持类似看法，预计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有望呈高位回落态势。

周茂华解释说，2022年供需有望逐步改善。随着全球疫情对供应限制舒缓，大宗商品供给有望逐步改善。此外，随着欧美空刺刺激政策退出，发达经济体政策逐步转向收紧，商品金融属性有望削弱。

对于企业自身而言，范若滢指出，“企业要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可通过合理使用期货、保险等金融工具降低价格波动风险”。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相关企业应该加强自身生产经营的风险管理，善于利用各种手段去做好风险预判和预案，有效规避价格频繁上涨给企业带来的风险。”